

求学路上

QiuXue LuShan

郭学焕 著

作家出版社

张浚生题词
求是学子大作出版

求是学子
以学明志

张浚生



中共浙江大学党委原书记张浚生题字：求是学子，以学明志

自序

俗话说，“十年寒窗”。人们常借此说明求学、读书的艰苦。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度过了十八个寒暑，有艰辛，但更有快乐。刚刚脱稿的《求学路上》，正是记录我这十八年的苦和乐，这十八年间相伴相生的人和事，也许，从中还能听得到这十八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脚步声。

如果说，2003年，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第一本记忆文学散文集《岁月金兰》，那末，此番写作《求学路上》，则是由“一句话”引发的。

那是2007年间，我返诸暨老家，家乡的“父母官”热情相待，在与市委书记陈长兴（现任中共绍兴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张仲灿（现任中共金华市市委常委、东阳市市委书记）的交谈间，他们对我已连续出版《岁月金兰》、《饮马衢江》，表示祝贺，接着话锋一转，说，郭厅长，你写了金华、兰溪、衢州，怎么不写写老家诸暨呢？

“写写老家诸暨”。此话说得在理，也提醒了我。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新中国成立我跨入校门。小学、中学一直在诸暨读书，1962年考入浙江大学，才离开家乡到杭州上学。我的求学阶段正是我们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新中国的建设，后来，又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到了杭州读大学总算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生活环境，然而，快毕业时，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因此延期一年毕业，原来大学五

年学制成了六年。十八年的求学路，其中有十二年是在家乡走过的。如果我把这十八年间的所历、所思写出来，那也就把家乡写入了我的作品。我心想，书名不妨称《求学路上》。这岂非合着“父母官”的要求，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2009年3月，记述我在任浙江交通厅厅长八年的散文集《驰骋浙江》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浙江省副省长王建满为该书题词“难忘岁月，交通真情”，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交通部原部长黄镇东和浙江省交通厅厅长郭剑彪为该书作序，给以勉励，令我感激不已。我深深地感到生活的美好、友情的珍贵、鼓励的重要。在此，我怀着感恩之心，数说一二。

记得当年我《诗书篆刻作品选》、《诗选》和散文集《岁月金兰》出版后，负责上述著作编辑工作的人民日报出版社张亚平老师对我说，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董伟（现已任社长）想见见我。有一次我去北京，由张亚平老师安排，我与董伟副社长见了面，在场的还有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石英老师，以及与我同去的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交通联络处主任俞光华、《中国交通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贾刚为。谈话在十分愉快、宽松的气氛中进行，不过我心里在想，董伟副社长为什么要见我这个不知名的作者呢？事后，我把与他谈话的主要内容稍加梳理，发现，他那天主要说了三层意思：一是，他说我的文章文笔清新，可读、可看；二是，他说文笔好的作者毕竟很多，不过，文内有不少自作的格律诗，这有点不容易；三是，他又说写格律的人也还是不少的，只是能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历，以如此方式如实写出来，供大家阅读，说明作者心里是坦荡荡的。

天哪！我与他素不相识，唯一联系是我的作品，他竟给了我如此鼓励，真是太感激了。我自知水平不高，他的评价只能视其为鞭策，激励自己继续勤奋地学习、创作，更加热情地去讴歌我们伟大的时代，赞美我可敬、可爱、可亲的领导、同事、朋友和亲人。

交通部领导十分关心浙江交通，也很关心我，2003年1月，全

国交通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张春贤部长说，老郭今年要卸任厅长职务，部里到杭州开个会，也算给他画个句号。我感谢交通部领导对浙江交通和我本人的关心，往事种种我已记入《骋驰浙江》。

2009年夏天，我参加中国公路学会在昆明召开的会议，便提前一天出发到长沙，我要专程拜访此时已调任中共湖南省省委书记的张春贤老部长，向他汇报我的近况并送上《骋驰浙江》一书。湖南省交通厅厅长吴亚中很热情，他派厅办公室副主任周超到机场接机，晚上，他还与长沙市市长张剑飞（交通部公路司原司长）请约我一同相聚，参加者还有其他交通同仁。全国交通是一家，置身于交通同仁之中，共同语言不少，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

张部长（我仍习惯如此称呼）嘱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邓仁杰安排，待我上午一到长沙，中午，张部长便邀我共进午餐，参加者还有邓仁杰和省政协秘书长欧阳斌（湖南省交通厅原厅长）。席间，我说到张部长在任部长时对浙江交通的关心，还说到当年到在杭州开会时的那一番话，他当即说，是这样说的。此时此刻，让我又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能如此关心地方交通，关心交通下属干部，给人温暖，令人感激。

我说到正在撰写《求学路上》，记述学生时代十八年的学习和生活。他说，那好，出版后，再给我看看。我连说，一定。张部长又一次给了我鼓励。

有不少领导、同仁，有不少读者，读了我的作品，也以不同方式给我以鼓励。现任临安市政协副主席、市交通局原局长陈有根在连续几天读完《骋驰浙江》后，给我打来电话，说看了很亲切，还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杭州黄河集团总裁王利军，是五金之乡诸暨市店口人，改革开放以来，他兴办企业，获得成功。杭州黄河集团是一家致力于轮胎销售的大型实业型公司，公司主营代理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普利司通、三角、玲珑。公司的销售网络遍布浙江各地，现公司总部设在杭州。王总读了《骋驰浙江》一书后，他拿了书让我签名，并说

一定要签上“吃得起苦，吃得起亏”几个字。这几个字是我写在书里作为自勉的两句话。他说，办企业同做人一样，靠拼搏，靠诚信。因而，也要吃得起苦，吃得起亏。

还有很多领导、交通系统的同仁和社会各界朋友，他们也以不同方式给了我不少的关心和支持。也许是对浙江交通的关注和厚爱，也许是对我劳动成果的肯定。我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支持和鼓励。

待我稍事休息后，2009年下半年，我开始了《求学路上》的写作。2004年以来，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写作，也就是说，我工作期间，因党务、政务繁忙，从来没有想过退下来后会写点什么，由于工作调动频繁，我本来不多的笔记本早已相继被处理掉了，我更无记日记的习惯，因而，只是凭记忆。当然，到了写作时必须查找资料，寻访当事人，以核准史实。这次也一样，要写老家，就得到老家去，以拾起往日的足迹，寻觅旧时的记忆。我择日回诸暨，想通过有关部门、单位查询资料，拜访当事人。

诸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钱建荣、市交通局局长王祖勇为我作了安排。当晚，市政协主席孟法明召有关部门领导一同见个面，我简单介绍此行的初衷后，孟法明主席要求各个部门提供方便，给予配合和支持。参加者还有市教育局局长吴江辉、市档案局局长王玉英、市志办公室主任许林章、牌头镇镇长孟龙、牌头中学校长边平友、书记马士中和诸暨市作家协会主席周光荣等。市政府办公室还安排秘书寿军岳随我进行寻访活动。

次日开始，我先后来到了诸暨市档案局（馆）、市志办、牌头中学等处调研，查找档案、资料，他们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期间，我拜访了中学时的但效先、阮昌明老师。还结伴同登勾嵎山。短短数天里，我四处奔忙，一路“绿灯”，收获不少，令我欣喜不已。

《求学路上》共28篇文章，三个方面内容。有关小学、中学阶段8篇，有关大学的学习、生活12篇，还有记述家乡的山水地理、历史人文、乡风民俗和我所在村落、家人亲友等8篇。

撰写此类记忆文学，我坚持一是真实，真实再现当年求学路上

的所事、所历，记述我的亲身感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二是正面写，善眼观世阅人，希望记下最美好的回忆；三是退后一步写，这句话是香港《文汇报》一位记者，当年看了我《岁月金兰》的部分文稿后，说我在“退后一步写”，意为多在溢美他人。诚然，多写、写好相伴、相生的人和事，乃吾之本意也。

书稿完成后，我将有关书稿请浙大教授杨文海、杨达寿，我高中同学杨仲坚、大学同学陈立夏等阅稿，提出意见，还请省交通厅办公室原主任王彬审阅全部书稿。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档案馆、诸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诸暨市档案馆、诸暨市交通局、诸暨市文化局和我的校友为我提供了部分插图资料。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为《求学路上》题写书名，浙江省政协主席周国富、浙江大学党委原书记张浚生为本书题字勉励。

在此，我对所有为我创作本书而提供帮助、支持和关心的领导、同仁、朋友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对在身边默默地关注我，让我集中更多时间写作的我妻孙满琴说一声谢谢！

由于本书涉及的时间较久远，记忆中难免疏漏之处，加之本人水平有限，文中会有不妥之处甚至谬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求学路上》付梓之际，我特别怀念含辛茹苦抚育我走过求学路上的父母，并藉此告慰生养我、教育我的父母双亲！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亲人、家乡的父老乡亲！献给求学路上可爱的母校、可敬的老师、可亲的同学们！

2010年9月 于杭州宝石居

参加“社教”的日子	182
满街红绿走旌旗	206
“破四旧”，灵隐禅寺幸免于难	216
五洲震荡风雷激	228
“大串联”，我第一次远行	236
同窗六载，泪别杭城	262
求是学子母校情	273

第三篇 百里家山别梦依

百里家山别梦依	300
登临王者之山	312
话说浦阳江 处处皆春水	323
于越流风悠悠情	332
西施故里才人多	34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63
西大山下的一个村落	374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385

校园里，真美丽

—

1950年9月，初秋，天高云淡，神清气爽。我背起书包，跨入了小学的大门，上学啦！

当时，我父母亲把我放在诸暨东山王村的外婆家，由外婆看养，因此，我上学也是在东山王小学，校长是王伯昌先生，东山王村人。当年，东山王小学设在一个大祠堂里，这也许同其他地方一样。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龄儿童要上学读书，而此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时还无力建造那么多的新校舍，故而，大多数农村的小学乃至初中，都利用当地的宗祠作校舍。

我怯生生地走进学校，在教师引领下，拜过孔夫子像，然后，找到座位。此时，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和新奇，如今，成为一名小学生，又显得那么兴奋和自豪。

上课了。第一堂课是语文课，同学们起立向老师鞠躬，坐下。教室里一片肃静，刚才还在那里没命玩耍的这帮孩子，此刻都一个个睁大双眼，伏伏贴贴地听从老师安排。老师让我们打开课本，一字一句地引领大家朗读起来：

校园里，真美丽……

登时，一片童声响彻校园，是那么响亮，那么清澈。

后来，老师还教我们唱这样一段儿歌：太阳光，金亮亮，雄鸡

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哪里来，全靠劳动来创造！

学校的课程，我记得主要有语文、算术、图画、音乐、写字等。

同识字一样，写字也是启蒙教育重要的一课。学生虽早已学会了讲话，能口头表达，但还不会写字。当时，农村的孩子，几乎没有学前教育，能写得出自己名字的，当是凤毛麟角了。写字课时，老师教我们如何磨墨，如何坐正姿势，如何手握毛笔，如何一笔一画地把字一个一个写在“尺白纸”上。开始，一般老师会安排高年级学生，手把手地教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先是“一、二、三、四……”又是“上、下、左、右……”“天、地、人……”。接着，便是抄写课文。然后，由学生自己练习。这样一边写字，一边学字。这，就是启蒙教育。

写字，令我兴趣无限。学生个个专心致志，全神贯注，有时一堂课下来，腰、臂、手腕酸酸的，但面对自己的“初作”，却又无比快乐。

纸张和砚、笔、墨都是按照老师要求自己准备的，所谓“尺白纸”，也是从当地小店里直接购买的书写用纸张，有不同的价格；墨也有“香墨”、“臭墨”之分，均可根据需要各自选择。为了节约用纸，我们往往写好大字后，再在两行大字中间的空格处，横的竖的重复写着一个个小字，把空处填充得满满的。

从此，我爱上了书法，后来读高小年级还临过字帖，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比赛，得过奖。这为我日后的书法练习打下了基础。

就这样，在东山王村，我迈出了人生求学路上的第一步。

东山王村坐落在东大山下，由于村民大都是王姓，而称东山王。这里山清水秀，自然生态十分优美。这里民风淳朴，邻里和睦。省政府常务副省长陈敏尔老家就是这个村，省政协副主席黄旭明的母亲也是这个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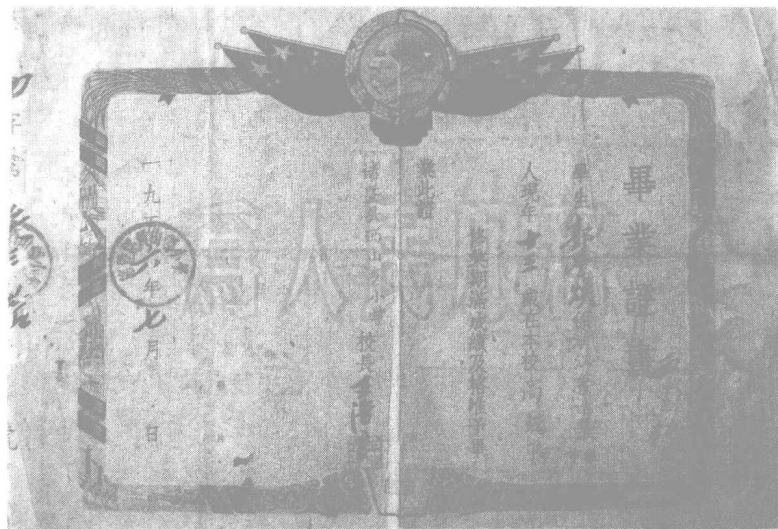
我外婆家的门前屋旁是桑园地、菜园，菜园里还种着不少水果树，有桃子、枇杷，当黄澄澄的枇杷挂满枝头时，我和邻家小孩会

在树下转悠，眼里望着这累累果实，久久不肯离去。当然，我们很听大人们说的话，小孩自己不能去偷偷地摘。等到果实成熟时，外婆和邻家校法叔叔等大人们，会从树上摘下几颗让我们尝鲜。每每此时，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跳跃着，在菜园里四处奔跑，显得那么的快乐。

东山王村的村口处，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据大人们说，当年日本鬼子杀进诸暨时，一队日本兵探索中第一次摸到村口，见这里树木参天，密不透风，还以为里边不会有村落了，于是折了回去。因此，东山王村免遭一劫。

村口的坡地上，长着许多高大的苦籽树，每年秋冬，树在秋风中摇曳，沙沙作响，树上成熟的苦籽会落下来，我们便结伴到树下草丛里寻觅一颗颗的苦籽。然后，用衣襟兜着，带回家里炒着吃，又香又好吃。

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我七八岁时，母亲到上海去做帮工，是我善良的外婆带着我。因此，我便在外婆家的村里上的小学。这年



作者小学毕业文凭（原本贴有照片，后来不知何时被取下）

春节，母亲回来了，我父母亲便把我接回家里，因此，一年级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在村里的西山完小继续读书直到小学毕业。

二

西山完小是当地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周围十多里地范围内的学生都到这里上学，学校利用西山下郭氏宗祠改造成校舍，祠堂有三进，规模宏大，一进原本进门处是戏台，两侧为厢房，中间是个大天井，后来戏台拆除了，厢房一楼改作教室，二楼成了宿舍；二进是大殿，改作学校的大会堂和部分教室，大会堂可容纳全校数百名师生开会，大殿屋顶高高的，十分壮观，室内的屋柱有六七十厘米直径，屋梁挑檐的木雕也极其精美；三进是教师办公室和厨房、餐厅，三进两侧有小天井，小天井里的桂花高丈余，据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秋天里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可惜，后来校舍被拆毁，如今，再也见不到了。

小学离家很近，我是走读生。我十分喜爱读书，成绩也很好。我很遵守上学时间，中午放学回家，每每一吃好中饭，就直奔学校。因而，回家时，一旦发现母亲还未做好中饭，我总是大声嚷嚷，怎么这么迟呀，快吃饭，快吃饭！这句话，我母亲生前还时不时地提起。

下午下课后，有时便留在教室里，做完了课外作业才返家。而回到家里，留给我的时间，除偶尔预习一下明天的新课程外，便是尽情的玩耍。

学校里老师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除了课堂上传授知识外，还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兴趣活动。

刚刚学习过光和光谱的知识，为了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陈老师便教我制作“显微镜”。方法是取一小块玻璃，用钳子钳住在酒精灯上烧，高温下形成一个小玻璃圆珠，那是用以折射放大的。“显微镜”制作好后，居然能通过这个小玻璃圆珠观察到被放大的了苍

蝇脚，是那么毛茸茸的。这便是土“显微镜”。不过有一个周日，陈老师带我制作玻璃珠子时，不小心酒精引燃，陈老师立即用隔绝氧气的办法，将其熄灭。我当时在一旁观看，显得十分紧张，事后我很佩服老师的果断处事，不然，火焰蔓延开去，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

我还模仿同学赶“会场”买回来的“万花筒”，自己制作“万花筒”。找一个盛铁笔蜡纸的纸筒，截下适当长度（约十余厘米），在里边插入三块镜片，呈三角形，一一相对，两端封起来，留一个隔着玻璃的观察孔。然后剪一些小块的红绿纸片，放到“三棱镜”筒内。使用时，对着光线，眼睛通过观察孔，可看到筒内的小红绿纸块反映到镜片上，又多又美丽，而且随着筒体的旋转，会变幻出各式各样颜色的图案。自己制作的小玩具，自然珍惜，大有爱不释手之感。一下课就掏出来，同学们轮流争着观赏，十分自得。

小时候，我爱动脑筋，喜欢动手做这做那。有时，放学后我会操一把钩刀（柴刀），用竹、木为材料，制作各种玩具，如制作“陀螺”，尖尖的底部还装上一个铁钉作“尖顶”，用鞭子抽打，让“陀螺”在地上旋转。还制作可旋转升空的飞翼，是利用风扇叶子的原理，把竹制的叶片两头削成一定倾角，叶片中间安上一根与叶片呈丁字形的杆子，只要旋转杆子，叶子在旋转中就会向上飞升起来。还有，看过“戏文”后，就学着制作宝剑、官帽、长长的胡须等等，凑几个小孩一同玩“戏”。日积月累，当刀垫的一条板凳已“伤痕累累”，我的左手上也在不小心间留下了些许刀伤的“记录”。

小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体育锻炼很重要。学校里体育是必修课，每周有二三堂体育课。晴天，学生们在校园的操场上做各类练习，如跑步、跳高、跳远；雨天，则在室内打乒乓球、跳绳之类。这些对于十多岁好动的小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每每此时大家都会十分尽力、尽兴，简直刹不住车，个个玩得满头大汗，一脸通红。

学校里照例每年都举行春、秋季运动会，一连两三天，停课比赛。我在校读书期间，西山完小的大操场扩建了，把原来周围的几

小鲢鱼或大一点的“白条鱼”。然而大的鱼要待水被搅浑时，才容易抓住，此时，你只要静静地观察，浑水里鱼会浮到水面来换气，一旦见到鱼露头，你把网轻轻兜过去，一提便是一条鲫鱼或大鱼。有一年，在村口的“上塘”里抓鱼，不善此道的父亲也守株待兔地抓到了一条约五六斤重的大鱼。

不过我曾发生过一次不测，那天在抓鱼的行走中，不知道该池塘有一处特别深，我失足掉进了深窝里，个子还不高的我一下去没过了顶，仅露出一只手在水面上晃动着。幸好在旁边一位叫“培义”的大人，一把抓住我露出水面的手，将我拉出深窝，才有惊无险，我感激不已。不过以后倒添了几分小心。

夏日的夜晚，很迷人。随着太阳下山，夜色降临，天气也变得稍微凉爽起来。只要不下雨，人们为了取凉，家家户户不再在闷热的室内用餐，而把餐桌移到门口露天的“道地”（晒场）上。为了驱赶蚊子，则在周围点燃起几支“焖烟把”。据说这是用一种带有药性的草扎成，可驱散飞蚊。

晚餐后，一家人就在屋外纳凉，大人小孩子有凳子上坐着的，有躺椅上躺着的。遥望满天星斗的夜空，凭晚风吹拂，谈天说地一番，有时还听大人们讲故事。人们在歇息中，消除一天的疲劳，释解盛夏的酷热。

不知不觉，假期就过去。待开学走进教室，一脸黑黑的，“野”过的心又收了起来，继续新一学期的学习。

在西山完小我读完了初小和高小，加入了少先队，当年，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及中队委员）和大队长（及大队委员），其标志是分别挂一杠、二杠、三杠的臂章。这三种臂章我有幸都挂过，大概曾担任过小队长、中队长和大队委员。也许在幼小的心灵里，这也是一件十分珍惜和自豪的事。



作者初中毕业文凭

止“三考”。于是，在“同文义塾”基础上创办了“同文书院”，书院由乡绅周介石先生负责。光绪三十年（1904），改名为“同文小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为同文公学，周载熙先生任校长。辛亥革命后，同文公学改名为同文高级小学，由南乡名绅张洲先生执掌校政。从1912年至1949年间，张洲、周如金、何劲、周有光、汪益培（子材）、张韶九等先后出任校长。他们都是有志办校，且学有所长的一批饱学之士，为“同文”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文中学无论学校规模，还是教育质量，当时列全县之冠。1930年，国民政府浙江省教育厅行文诸暨县政府，传谕嘉奖，以示鼓励。同年，浙江省教育厅督学张任天视察诸暨后，也曾训令诸暨县府，嘉奖同文中学。

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同文高小的校舍被日寇拆毁，校长张韶九先生坚守民族气节，拒绝接受伪职，仍坚持办学。民国三十三年（1944）春，校长张韶九先生与抗战中坚持办学的浙东中学校

光，锃亮锃亮的。如灯罩破了，就再换一个新的，也挺方便，新的真丝灯罩一经点燃，便逐步收缩、硬结，牢牢地挂在灯下方的玻璃罩内。

入晚，我时常看到工友张友仁、周青曼师傅等提着一盏盏点燃好的灯分别挂到各个教室里。于是，学生们鱼贯而入，各自坐在自己的课桌前，复习功课、做作业，还会抽时间预习第二天的新课。此时，教室里便一片寂静，只听得见煤气灯发出滋滋的声响。

1958年下半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经上级批准，学校开办了高中班，招收新生两个班级，学生89人，校名改为“诸暨牌头中学”。1959年，我初中毕业考入高中，成为牌头中学第二届高中学生。就这样，直到1962年高中毕业，我在牌头中学度过了初中、高中阶段学习，长达6年时间。人们说读书辛苦，“十年寒窗”，而我一生就读小学、中学、大学各学习6年，读了18年的书，真所谓成了“十八年寒窗”。待我们高中毕业时，学校已具相当规模。据资料显



同文中学老四合院校舍外景

分淀粉取掉后，留下的渣还舍不得丢掉，我父亲说，明年磨一磨，还可再吃。然而到了1962年，困难状况好转了，谁还会去吃这样的残渣，便被倒掉。

之三，师生共建新高中部校舍，我们感到自豪。

从1958年开始，母校招收高中部，两个班级，1959年又招收两个班级，这样，高中3个年级将有6个班的学生在校。

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原来“四合院”式的校舍已经不够使用。经上级批准，学校扩建新校舍。计划在四合院前方，进出大门大道的北侧建一幢平房6间教室，以供高中班3个年级6个班的学生使用。

在当时资金还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学校发动高中两个年级的学生自己动手，参与建造校舍。课余和星期日，高中部学生有组织地参加劳动。

我们曾经在老师带领下，数次结队去同山里坞底村扛（或抬）木料，一根木料虽不太重，五六十斤或七八十斤，尽管同学们大都来自农村，但毕竟年轻又少锻炼，加之“远路没轻担”，到山里来回有二三十里地，刚开始还感轻松，可是走着走着，就会感到愈来愈沉，有的肩上磨起了泡。同学们仍然一鼓作气，一路上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大家都能完成任务。

此外，我们也参加过搬运砖瓦、沙石材料，参加过场地平整等劳动，以及做“下手”活，协助泥木工建造校舍等等。

有苦有乐，当校舍落成，大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时，心里不禁升腾起无比的自豪，因为，我们曾经是新校舍建设的参与者、亲历者。

之四，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令人难以忘怀。

学校除了紧张的学习外，十分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生活很有规律，冬天清晨天刚亮，师生们便集队到大操场跑步。大操场在学校“四合院”校舍的南侧，有200米的跑道，两头各有篮球场和跳高、跳远的沙坑等场地。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经常领跑的有张林山老师。他个子不太高，一脸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跑起步